

数字交往的档案化及其可见性管理： 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分析

王 昀 王艳华

【摘要】数字媒介技术持续推动了一种即时存档、分享的社会交往文化。本研究以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作为案例,考察以屏为媒的自我呈现方式如何组织人们与群际网络之间的关系。屏幕复制带来了线上痕迹的档案化,视觉文本在被调用过程中,提升着个体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推动私人生活向公共生活开放,从而创造内容流通环境新的互动形式。相较于以视觉消费为导向的媒介研究,以截屏为代表的用户日常实践,提供了观察线上参与文化的另类视角。

【关键词】截屏;数字化;可见性;档案化

【作者简介】王昀,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研究员;王艳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3.1.75~86,121~122

一、引言

数字技术通过不断推动用户披露和共享信息,令私人生活向公共空间开放(Bruno, 2012)。与此同时,个人信息管理也获得更多灵活度,用以维系隐私与社会化网络之间的关系(Lange, 2008)。这种新媒体使用与自我呈现之间的矛盾,构成观察线上参与行为的重要线索:尽管社交媒体在功能上赋予了用户自主设定信息发布偏好的主动权,以屏幕为中介的社会互动毕竟基于单向、非对称的视觉关系展开,一旦在线上表露自我,便意味着隐私管理失控的可能(吴璟薇、唐海景, 2020)。本研究以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作为探讨前述问题的具体案例。当下,截屏现象活跃于公共言论空间,创造了数字环境重要的视觉文本类型。Jaynes(2020)认为,截屏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深度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运用截屏,用户将聊天信息、浏览记录等屏上生活经验,留存为视觉档案,并经由复制予以公开展示,使之成为可供讨论的文本。以屏幕为场景展开的媒介生活实践,创造出新的社交形态,也加速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

间的流动与转化。鉴于此,本研究追踪线上用户获取、使用和传播截屏的过程,探讨截屏行为背后的技术和文化因素,呈现人们基于技术应用进行自我表露和信息管理的细节方式。通过考察代表性个案,试图描绘以屏幕为中介的数字生活档案化趋势,从而理解个体如何经由媒介化行动,建立并协商私人经验和群体参与之间的关系。

二、屏与“我”:一种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实践

(一)可操作的屏幕:“屏”作为社会互动界面

人们对屏幕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已是新时代数字生活的显著现象(Sigman, 2012)。尤其在日益蓬勃的景观消费社会,屏幕构成了互联网文化工业模式的基础(Briziarelli, 2019)。作为媒介物的“屏”不仅是视觉体验中被凝视的对象,也是社会交往仰赖的技术载体,形塑着人们参与线上生活的意义结构。历来媒介研究强调,屏幕决定了何种现实可见或不可见,乃至影响人们接纳、批判或质疑主流价值观念的方式(Vitols & Lynch, 2015)。人们操作屏幕,浏览内容,同时建立起观看世界的框架:诸如计算机、电视、手机等

不同类型的电子屏相互组合,深刻嵌入日常生活,共同构筑现代社会图像兴盛的文化历史(Friedberg, 2006)。

数字生活总是通过与屏幕的交互关系得以展开。围绕各式屏幕物质属性组织起来的空间秩序,也被认为会引发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苏状, 2012)。智能触控设备赋予人们“具身操演”式的权力,它允许观众占有和编辑图像,令个体不再只是“经典观看装置中的旁观者”(徐亚萍, 2020)。依据 Moore(2014)对图像共享网站 Flickr 的观察,玩家对游戏画面的捕捉行为,即体现了游戏、屏幕显示和身体之间的仪式化关系:对屏幕的上手操作放大了感知、阅读和反馈内容符号的能力,也推动个体将对图像技术的运用投入社交领域。某种意义上,屏幕象征着技术物与媒介实践的交汇点,它既是个人数字生活的展示窗口,又是社会交往发生的场所,承载着多种多样的视觉生产文化。尤其伴随满足“期待定制、按需访问、社交联结,以及建构与影响媒介内容”的小屏设备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具规模性的用户经由智能终端接入线上公共空间,推进着个体经历与流行文化、历史叙事的融合(Hodgson, 2010)。

鉴于屏幕指向具有互动性的社会界面(de Souza e Silva & Frith, 2012: 4),聚焦这一媒介使用过程,有助于探索主体如何实现自我媒介化,透过符号象征系统调整行动模式,建立其在数字网络中的位置。其中,用户对视觉文本的组织 and 再生产,衍生出一系列有关传播隐私问题的关注。Gane 和 Beer(2008: 54-64)强调,屏幕设备定义着人们与周遭互动的文化体验,更令不同形式的权力与监视成为可能。以屏为媒的沟通形式蕴含强烈的单向性,这意味着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自身被何种目光注视,线上活动产生的痕迹会被谁获取。这种不确定反映出技术和组织的幕后窥视以及其中存在的权力不对等关系。研究指出,用户对自身被“监视”的感知,将影响他们的行动表现,进而导致数字交往当中相互冲突的人际规范(Duffy & Chan, 2019)。这种屏上境况的自我想象,使得人们不断依据对社会期望的考量,建立与他人打交道的反身性实践。线上用户对信息可见的管理,可供促进理解个体行为与社会互动之间的依存关系,揭示人们的形象展演策略如何协商私人与公共的弹性空间。

(二)线上空间的数字痕迹与自我档案化

线上空间的内容生产消费,紧密围绕对数字痕迹的读取和使用。它们以后台数据或可见的图像文本等形态存在(Draper, 2020),后者总是指向媒介化的用户自我呈现。个体在卷入各类信息流过程中,本身便不断创建内容、分享行动来建立“生活档案”(Rollason-Cass & Reed, 2015)。以屏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提供了相应支持条件。随着移动基础设施成为工作生活展开的重要载体,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围绕屏幕中介展开,这种“在云端”的虚拟现实强化了对存证的要求。Garde-Hansen(2009)因而声称,随着新技术的诞生,人类社会对身份、记忆和故事的需求,正在推动“数字档案热”:一种将个人历史和经验保存下来的愿景。Nora(1989)认为现代记忆是“存档的”,历史的加速使得我们的记忆“完全依赖于痕迹的物质性、记录的即时性和图像的可见性”。我们以档案尤其是视觉文档的方式互动,记录并创造新的文化,“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生活通过档案得以开展,而非仅仅存储于其间”(Gane & Beer, 2008: 82)。

档案不仅意味着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媒介物,亦是先于内容而形成的“从私人到公众的制度通道”(Lynch, 1999),蕴含以信息和知识为中心的秩序关系。在 ICT 技术的支持下,档案日渐超越代理人式的管理模式,变得去中心化和公开化,它越来越面向公众开放,允许私人访问、创建、维护和使用(Gane & Beer, 2008: 74)。社交网络流行的数字档案背后,包含了用户保存知识和记忆的自主方式。因此,数字时代的档案并不以静态信息库的形态存在,而是一系列操作过程,一种使用者协同合作的“参与结构”。如 Lynch(1999)指出,新媒介环境的档案拥有“流行的”形态,正是透过广泛的复制与传播行为而实现。在从传统制度语境和印刷形式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数字档案的意义体现在参与者生成和使用其内容的片刻,同时也造就了存续时间上的即时和短暂特征。

显然,线上空间的信息存档难以脱离围绕屏幕为基础的操作,用户界面的各类活动以图像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私人记忆的一部分,又持续纳入社交生活的“功用”之中(Jaynes, 2020),档案的获取、留存和分享由此合为一体。随着互联网工业透过日趋规

模化的个人资料设计及管理进行用户锚定、生成平台数据(Szulc, 2019),档案化的线上参与模式逐渐与用户日常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数字档案生产固然是个人行为,将用户平凡、琐碎的生活足迹囊括其中;另一方面,它在内容环境流通并被其他成员知晓和调用,又使之具有纪实的公共意味。诸多实时生活记录被上传、收藏至社交平台,这些用户信息既体现档案这一媒介类型发生的变化,也延展出其背后承载的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互动性(Gane & Beer, 2008: 74)。

(三)自我的数字图像与不确定的可见性

透过屏幕视窗观看、复制和占有数字痕迹的行为,往往带来个人隐私边界的不确定性:用户在多大程度上展示自我?谁介入、分享、解读个人的数字生活?这一过程伴随着可见性管理的失控风险。既往讨论中,可见性总是被视作划分私人 and 公共空间的重要标准(Hatuka & Toch, 2017)。阿伦特(1999:44)认为,“公共”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出现的东西都为人所见所闻,人们展现的实在和主观见闻构成“公共生活的意义”。可见性是“看见”与“被看见”的知识隐喻,它关乎个体能否被共同世界感知和承认,又包含人们对主体性的要求,是公共生活参与的重要前提(Brighenti, 2007)。因此,可见性概念关乎个体自我呈现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技术中介,或者说,牵涉传播科技如何改变社会交往方式,从而创造投身公共领域新的可能(Thompson, 2005)。例如, Pond 和 Lewis (2019)便注意到,以标签、表情包为代表的表现方式能够强化群体模因,实现公共网络动员。

当数字生活愈发与电子屏幕紧密结合,图像仍然构成线上参与的重要基础。人们将现实生活视觉化,投入线上空间,不断生成新的可见自我。过往讨论认为,由于图像更易获得关注,用户因而倾向于借助视听文本进入公共讨论,以此获取认可,表达不同程度的社

会诉求(Thompson, 2005)。新兴摄影设备为传播图像信息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人们能够随手记录并分享自认有意义的内容时刻(Allan, 2017),这些视觉文本在宣示个体亲身在场之时,也唤起观众共同参与见证的想象(Andén-Papadopoulos, 2013)。借由屏幕互动,人们不仅观看着自己,并且在其中“社交、娱乐、关心自己和其他人”,形成在不甚相关时空下的沟通交往(Bruno, 2012)。

个体越是深入地参与线上生活,越会产生更多可被捕捉、以视觉档案形式存在的数字形象,由是日渐受制于不同主体的审视,令“监控成为整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Lyon, 2017)。隐私的界限感变得被动,个体需要在“我被谁观看”的期望与想象中调整自身行为。换言之,可见性是透过媒介技术持续达成的被曝露和被认识的实践(Hatuka & Toch, 2017)。人们基于对群际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理解,依循特定情境来组织信息披露行为。可见性及其衍生的不确定风险,构成解释用户行为,理解线上公共文化动态的有力线索。后续讨论中,我们将截屏这一日常媒介实践纳入考量,探讨屏幕界面如何建立私人生活的可见档案,提供数字交往新的表述资源,以及截屏文本的复制传播如何投射个体与群际文化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深度访谈分析用户关于截屏的经验叙述。截屏行为相当碎片化且具有偶然性,需要获取相关文本作为验证和辅助分析材料。另外,由于屏幕被截取之内容常产生于私人社交情境,不可避免涉及隐私问题,必须事先向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获得资料使用许可。具体做法上,为避免内容同质化,力求做到经验材料丰富可靠,研究采取公开招募和关系推荐的方式招募受访者。招募信息经研究者和助理的个人渠道发布、转发。经过预访谈阶段对所有招募对象情况的评估,最终确定 15 位受访者,具体名单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工作经历	编号	性别	年龄	工作经历
F1	女	25	文员	F7	女	24	内容运营
F2	女	24	工程设计	F8	女	34	IT 行业
F3	女	24	文员	M3	男	33	公交车司机
M1	男	27	IT 行业	M4	男	32	在读博士
F4	女	26	公务员	F9	女	21	新媒体实习生
F5	女	27	销售	F10	女	21	公共关系
F6	女	24	教师	F11	女	21	内容运营
M2	男	30	IT 行业				

正式访谈于2021年9月进行,通过微信、电话与线上会议等方式完成。研究者在访谈开始前向对方说明隐私保护和信息使用的问题,征得对方同意后,保存录音、文字材料和受访者提供的其他信息作为后续分析之用。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截屏行为的动机、对截屏的体验与认知,同时获取访谈中曾谈及的、具有代表性的图像文本,以讨论媒介内容呈现的特定意涵。基于上述经验材料,研究者进一步描绘用户获取、分享和使用截屏的线索,分析这一活动如何令个体重新建构数字环境中的自我概念,发展其社会网络关系。

四、数字档案化:截屏的获取、流通与使用

(一)截屏:线上生活的视觉纪实

屏幕复制技术往往被称为“虚拟摄影”或屏上摄影,截屏现象正是摄影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和发展(Moore, 2014)。尽管较之摄像机镜头,屏幕复制似乎缺少创造力,但界面如同“摄影眼”,使用者依循相关美学标准,发掘屏上生活的片刻闪光之处,快速抓住虚拟空间中值得纪念的互动场景,例如恋人间的视频聊天画面,或者管理者在公司群里突然的“人情味发言”(F1),将无法具象的情感和转瞬即逝的线上内容定格下来,从而强化日常生活的事件体验。F9印象最深刻的一张截屏,即发生于与父母视频时的某个时刻:

“当时本来视频是对着他脸,说了几句之后,他说他们在什么河边散步,然后说还看到了彩虹。他说完就把那个镜头翻转,然后就看到那个彩虹。非常矫情地说,我第一次觉得我的父母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当时很想跟他们讲话,但是又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不要跟他们讲了,让他们自己玩……我印象中,至少有一两年没有让我有这种对于父母的情感到达那样一个浓度。”

这张截屏随后被F9珍藏在电子相册之中。如桑塔格(2008: 10)强调,摄影既是记录也是行动,是体验、参与某些事的“主要手段之一”。F9透过屏幕这一中介,定格视频片段,据此重新诠释对家庭情感的理解。就此意义而言,截屏可视之为对私人生活的介入,它将用户对日常生活的感知框架化,在完成主动纪实的过程中,既有社会关系也透过媒介物的形式再现出来。在摄影实践中,拍摄者以及拍摄者和拍

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常常隐而不彰,截屏却频繁用于展示人们的实际社会关系,个人化色彩显著。截屏者和他人的私下对话是较为常见的类型:头像、会话框、昵称和实际聊天内容,不仅暗示另一位当事人在场,也呈现彼此的朋友、长幼或上下级等关系。这种可视化的交谈内容及其附着的社会身份,反而提示了截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在苏珊·桑塔格(2008: 4-7)看来,摄影的革命性在于它创造了以照片为标准的新感受力,一种真实复制的隐喻,从而提供了将经验民主化和政治化的潜力。截屏的创作自由度似乎不及传统摄影,但这一“缺陷”却突出了截屏文本对交往场景的客观再现(Švelch, 2021)。对于前述F9来说,其珍视的手机截屏是家庭关系的具象化。面对社会交往中纷繁的日常对话,通过捕捉特定互动情境,将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语”留存下来,个体建立了相应的纪实框架,进而加深对共同体纽带的认同感。一定意义上,屏幕复制是对当下生活经验的承认,线上用户借此创造他们的个人档案和记忆,并将之融入互联网空间广泛视觉纪实的一部分。

截屏体现了数字档案与传统档案概念的不同之处:它充满即时性和流动性。媒介复制技术令线上内容的浏览、获取和存储功能融为一体,快速进行视觉纪实的便利,也呼应着人们对内容流通环境的风险感知,令截屏几乎成为即兴触发的行为:“我有预感他朋友圈应该是之后要么会对我屏蔽要么删掉我的,于是我就截了个图。”(F4)截屏被用于记录线上即时体验,确认其真实感,为日后留下可供援引的证据。这同时塑造了截屏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截屏文本的产生固然意味着图像化的数字痕迹具备进入公共网络的可能,使用者可以即刻存档,也可能不会再次打开并且随时会清理掉积存在相册中的图片,“使用者只是漫不经心地管理着这些(存档的)场所”(Gane & Beer, 2008: 73)。因此,大多数截屏的意义停留在操作屏幕完成截取的那一瞬间——一种将屏幕框定的图像保存下来,或者“觉得自己保存了它”的状态。

(二)分享:截屏流通的社交逻辑

应用于亲友关系等私人场景的截屏行为并不具有强烈的公共意涵,大量日常截屏也可能被定期

清理或仅限于私人收藏。不过,线上活动一旦经由屏上摄影所目击,具化为图像的社会关系便被赋予进一步展演的机会。截屏的可复制属性,令文本存在从私人领域被调取的潜力。伴随个体的自我表露诉求,截屏协助建立了线上交往关于分享的叙事。这一分享方式掺杂着创作者对内容流通安全性的考虑,往往颇具矛盾:一方面,受访者时常在社交平台公开私人聊天记录,用以展示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界面实时显示的时间、电量、通信服务商等信息也被刻意保留,用于突出确凿感。另一方面,受访者会根据是否“有趣”或“有用”的判断,来决定截屏文本能否进入更广泛的流通范畴。因此,传播私人谈话的动因,实际取决于截屏可作为严肃证据物或娱乐消费对象的双重属性。例如,具有消遣色彩的“找乐子”是受访者分享截屏的常见动机,这种以调侃为主的社交行为主要在小圈子范围展开。吐槽老板和同事是被普遍提及的情形之一,有本人“出席”、老板或同事发言内容的截图,是与其他朋友之间重要的闲谈谈资,一般只会出现在较为亲密的交往圈层,以避免内容扩散,给截屏者带来麻烦。这种私人信息的让渡,被用以巩固内群体纽带。分享私密的截屏对话,因而成为一种信任关系的讯号。

大多情况下,人们会顾及并维护社交活动的隐私边界,复杂的公共网络却总是孕育诸多让截屏“出圈”的机会。由于发生在私人屏幕的复制行为相对隐蔽,个体无法得知聊天信息是否会被单方面存证,更无从了解如何被二次传播。在Jaynes(2020)提及的案例中,一名女孩将评价他人的聊天截图发在自认为可靠的群组,结果这一分享被成员再度截图泄露出去,给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本研究受访者广泛注意到这一风险,在其叙述中,他们会有意识地控制信息可见程度,避免二次转发引起的麻烦。M1表示,自己在微信通常以展示朋友与自己聊天时贡献的搞笑语录为主,发布其他个人事项时则相当克制。针对不同平台,人们也会选择相对应的处理方式。F2提到,微信熟人太多,所以会匿名处理在朋友圈分享的截屏,微博反而不会。用户对截屏文本的可见性管理体现出灵活考量,取决于“谁可能会看到我”的监控想象。

不过,对娱乐性的强调似乎强化了受访者对内

容分享的乐观评估。F3经常挑选有趣的聊天截图在微博发布,在她看来,公开这些内容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困扰。部分访谈对象认为,一张截图并不会承载太多个人信息,不足以造成隐私威胁。还有人认为是认为,在海量信息规模的社交网络,普通用户的能见度实际相当有限,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三)凭据:数字交往中的战术使用

社交媒体日益卷入生活世界并提供新的互动方式,使用者则善用其机制,“懂得掌握不同的机遇,将科技原始设计挪用为资源,去构筑自己的兴趣与欲望”(吴筱玫,2016)。前述截屏行为反映出对日常生活的纪实与分享。不过,本研究更为关切的是,截屏呈现的自我可见性,如何被用来协商各类情境中的人际网络,乃至强化相应交往规则。公共群体中,隐私信息的投入常被成员所忌讳,但原本归属私人的截屏信息却经由群际网络,得以重新组织社会参与。借由个体经验的数字档案化,录存的屏幕界面因其再现了原始互动语境,反而凸显信息真实性,形成交流双方的共识基础。截屏于是成为一种叙事凭据,被策略性运用于社会交往中的战术实践。

一方面,截屏文本蕴含的内在恒定性,提供了个体规避社会互动风险的方式。除了与亲友相互转发趣闻或纪念性内容,受访者谈到,在更为严肃的工作场合,截屏同样有着特殊意义。例如,他们习惯于将公司发布的消息或者客户需求直接截取抄送给同事。相较于复述内容可能产生的误导,“截图转发”能够再现完整会话语境,从而快速准确地传达信息。对个体而言,使用截屏留取证据,有助于省却沟通成本,规避冲突,实现“自我保护”。M1声称,出于信息保护意识,他并不乐于在社交网络分享截屏,但上班期间却频繁使用,尤其将截屏作为一种免责手段:

“我用截图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信息,比如领导说要干啥,然后直接转不太好,我就截个屏,然后把他微信名一起截过去,然后就转给别人,表示一下是领导真的这么说了,不是我自己说的……我仅仅是一个转述者……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用担责任。”

在访谈对象看来,截屏几乎等同于一手信源,帮助使用者淡化自身在交往场域中的位置,避免承担

多余的解释工作。与之相似,由于经常要和部门主管对接、传达消息,F1遭遇职场矛盾时,会把相关人员的聊天记录直接转发给对方,从而将自己从潜在的冲突关系中排除。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线上舆论环境中颇为常见。由于转述者将自己隐于屏后,随着对截屏内容的解释权移交给外部观看者,针对截屏内容的理解与讨论也易被扩散至更宽泛的公共网络,造成信息沟通中不对称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人们出于个性考量,也常运用媒介复制技术,篡改截屏的客观凭据属性。“照片和真实事物之间的锚定关系,为照片伪造者提供了蒙混过关的机会”(Švelch, 2021)。由于图像软件提供了各种信息编辑功能,这使得真实性本身也更易被操控。事实上,伪造截屏的成本并不高,互联网空间随处可见的截屏对话,便可能是由自动生成算法的软件所制作。除了借助软件工具,用户还会使用一些更具伪装性的方式。F3分享了一个制造截屏来讨要薪资的经历:

“……老板拖着不发工资,拖了有小半年吧,到了大年三十前几天,我就用两个手机号,其中一个假扮找我要钱的朋友,营造一个极度缺钱,还有外债,大年三十都不好过的悲惨人设,把两人对话聊天(截屏)发给我老板了。”

经验材料中,截屏作为战术体现在用户选择针对何种对象、在何种时机或以何种方式使用,比如突出、隐藏哪些内容,甚至利用人们对截屏的客观性感知来伪造视觉元素,以此达成不同目标。F3就特别强调,“这一招”是根据她对老板性格的了解,判断老板“吃这一套”的基础上才使用。为了增加文本的现实感,她甚至特地留下“朋友”的头像和姓名不作处理,认为这些信息的存在,能够让自己“进行协商时更有底气”。又比如,为了吐槽上级凌晨时仍在吩咐工作,F7有意将手机收到消息的闹铃界面快照下来。在她的截屏中,界面的时间显示便是被框架化的重要符号,用以传递对劳动压力的不满。可以说,伴随数字设备在生活场景的高度应用,人们依循其实际生活遭遇,制作不同截屏类型,将其演变为实现各类社会互动目的的战术实践。

五、管理可见性:截屏流通的秩序规范

某种意义上,流转于社交网络的截屏文本近似

介于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准公共物”,其性质取决于人们如何管理这一档案的流通:分享给谁、如何处理隐私信息、多大程度上予以公开等等。用户则通常根据特定议题,基于对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的判断,来调整行为预期,逐渐形成一系列有关截屏复制的自我规范。访谈对象中,尽管F5热衷在工作中分享趣闻,但只限于发布在亲密圈层;F8对隐私问题持更谨慎的态度,即便身处“关系还不错的小群”,一旦有并不熟悉的新成员加入,她便会截屏涉及的关键信息进行马赛克处理。除却这些相对内群体的环境,受访者也会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将信息分享在线上空间以促进讨论。F8曾将居委会工作人员不合规的行为发在微博,尝试引起更多人关注。这些即时经验经由截屏而档案化,造成被大规模复制的可能,原本私人界面上的信息被推入公开环境,既树立了截屏者作为“知情人士”的身份权威,也强化了他人引述时的话语可靠性。

为进一步讨论截屏流通的规范形成及其背后的文化权力因素,我们可以继续聚焦这些日常媒介实践发生的微观场景。本研究受访者多数已参加工作,相较于家庭环境,办公室文化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对个人行为有着很大影响。作为技术人员,M1指出即便是信息量较少的截图也有被反向追踪的风险。F8身处互联网企业,行业流动性较高,社交圈子更换频繁,由于对巩固社会关系并不抱有可持续的预期,因此其转发截屏内容时也较少感到约束。而对于工作性质相对稳定的单位,人们之间通常会互相维系长久的同事关系。这种个体间联结颇为紧密的环境,则形成不言自明、更为保守的信息管理规则,F9说,“能怎么做不能怎么做”,是“大家都知道”的。

受访者运用截屏表露自我形象及其群体关系,虽高度灵活,亦受制于周遭社会秩序。前述办公室截屏规范的形成,即体现了来自技术平台、组织及同行之间的“想象监视”或“同伴监视”(Duffy & Chan, 2019; Jaynes, 2020)。个体所在组织常常主动介入其中,影响成员对数字形象的可见性管理。过往舆论事件中,不乏将公司资料或相关内部发言在社交网络公开,掀起公共讨论,从而导致组织管理危机的案例。为了保证自身形象的控制权,组织需要对员工

的社交媒体使用作出规定,由是引出围绕信息管理的权力博弈。不少受访者提及,单位会通过新人培训、强调内部保密制度、信息监测等方式,对信息传播行为提出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并未明文规定,但在入职培训时会被着重强调,以此告诫新人不能泄露信息,否则“可能会有什么处罚”(F9)。除了制度文化的影响,“反截屏技术”(Hu, 2020)也被广泛运用于组织管理,以此阻止内部信息被复制或留下痕迹。

来自组织的措施令人们不得不对个人行为加以约束,其间体现出获取和调用档案的自主限度,以及日常媒介实践与制度机构之间的关系。F7在准备离职前,想要截取在钉钉的工作打卡记录,但突然跳出的弹窗提醒她截屏记录将会通知给群管理员。因为担心想离职的信息被管理员发现,她最终放弃了截屏。

F4提到,工作群中的确有人贴出截图作为凭证使用,但这种行为在她看来是非常不成熟的表现。尽管公共群体中,行动者能够通过信息不对称性等策略为自己争取利益,但仍需遵守彼此默契,接受组织环境的限制,根据其他成员能接纳的方式进行决策(费埃德伯格, 2005: 170-177)。因此,在日常媒介实践与现实社会秩序相互嵌合的过程中,个体的可见性管理总是与群际网络中的角色定位紧密相连,进而持续发展出人们建构自我意识、参与线上生活的创造性方式。

六、讨论:截屏实践的公共性意涵

作为当下数字生活的常态,截屏表现出线上参与过程中私人领域的流动性。线上用户总是处于迁徙状态,屏上摄影克服了这种不可见性,完成针对数字交往痕迹的目击。以私人记忆为基础的图像存证,被挪用于社交表达和更为广泛的公共展演(Moore, 2014)。以截屏为代表的数字留痕构成个体自我呈现的一部分,同时,当人们有意识地将它复制转入社交网络,截屏文本也继而承担了关于他人的关系想象。“媒介化社会空间中关系的隐秘和敞开成为新的矛盾指向”(周翔、李稼, 2017),截屏所示情境的私密与可分享特征,揭示了要求互联开放的技术逻辑和私人主体诉求之间的矛盾。Dahlberg(2018)指出,新媒介的可见性问题衍生出如权力监视、误导性信息传播、恶意曝光等一系列复杂现象,人们“被看

见”的形式,乃至人们如何建立看见自我、表达自我的条件,构成了探讨当代健康公共生活不可忽视的维度。可操作的屏幕和媒介复制手段令线上交往情境定格为具有固定意义的图像文本,同时被进一步赋予演化为群体话题的潜力。很大程度上,私人文本一旦被复制进入流通领域,用户实际已经失去管理自我可见性的余地。数字足迹脱离了个体对它的占有,衍生为被独立公开评判的证据物。“我”不在场而被看见的线上出席由是成为常态。

总的来说,以截屏为代表的数字档案化现象,有助于探讨当下围绕各类媒介物编织的生活实践网络,以此检视个人与群体文化之间的微妙相处模式。数字化自我总是呈现为被电子屏幕框定的视觉对象,包含一系列操作功能的技术界面将用户信息变得可复制、可编辑,人们因而不断审视自我,调整隐私管理方式,以“策划一个经得起公共监督的数字角色”(Duffy & Chan, 2019)。在生产和复制视觉文本的过程中,私人活动得以被公开展示和评价,构成“事件本身展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Thompson, 2005)。线上痕迹经由形形色色媒介实践被档案化的趋势,映衬着愈发“失落”的私人空间,令我们有必要追问:人们如何将镜头转向自己,完成屏上形象建构?以类似截屏为代表的媒介纪实手段怎样生产新的论述资源,发展个体面向群际网络的相处模式?伴随不同社会权力对可见性管理的介入,这如何影响个人关于互动行为的考量?面对人们深度投身数字屏幕的时代语境,研究者有赖于围绕新技术使用、用户表达与社会交往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不同媒介类型及其使用逻辑如何丰富线上生活的体验方式,并推动私人经验进入群际网络,汇融到更具文化意义的公共世界当中。

参考文献:

- [1]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著(2005). 权力与规则[M]. 张月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汉娜·阿伦特著(1999). 人的条件[M]. 竺乾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3]苏珊·桑塔格著(2008). 论摄影[M]. 黄灿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4]苏状(2012). 城市公共屏幕的公共空间建构——兼作国

内外户外公共屏幕理论与屏幕实践引介[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72-79.

[5]吴璟薇,唐海景(2020). 流动的界限——社交媒体公与私的情境实践与管理[J]. 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54):95-125.

[6]吴筱玫(2016). 网上行走: Facebook用户之打卡战术与地标实践[J]. 新闻学研究(台北)(126):93-131.

[7]徐亚萍(2020). 运动图像的操作化: 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J]. 国际新闻界(6):55-75.

[8]周翔,李镛(2017). 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 理论、实践与展望[J]. 国际新闻界(4):137-154.

[9]Allan, S.(2017). Photojournalism and Citizen Witnessing. In B. Franklin & S. A. Eldridge II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pp. 487- 497). London, UK: Routledge.

[10]Andén-Papadopoulos, K.(2013). Media Witnessing and the ‘Crowd-sourced Video Revolu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12(3), 341-357.

[11]Brighenti, A.(2007). Visibility: A Categ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urrent Sociology*, 55(3), 323-342.

[12]Briziarelli, M.(2019). Snapchat’s Dialectics of Socialization: Revisiting the Theory of the Spectacle for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2(4), 590-609.

[13]Bruno, F.(2012). Surveillance and Participation on Web 2.0. In Ball, K., Haggerty, K. & Lyon, D.(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pp. 343- 351). London, UK: Routledge.

[14]Dahlberg, L.(2018). Visibil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Normative Conceptualisation. *Javnost-The Public*, 25(1-2), 35-42.

[15]De Souza e Silva, A., & Frith, J.(2012). *Mobile Interfaces in Public Spaces: Locational Privacy, Control, and Urban Sociabil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6]Draper, N. A.(2020). Metaphors of Visibility: Rhetorical Practices in the Normalization of Individual Online Image Manage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4(11), 1627-1645.

[17]Duffy, B. E. & Chan, N. K.(2019). ‘You Never Really Know Who’s Looking’: Imagined Surveillanc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1(1), 119-138.

[18]Friedberg, A.(2006). *The Virtual Windo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Gane, N. & Beer, D.(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NY: Berg.

[20]Garde-Hansen, J.(2009). My Memories? Personal Digital Archive Fever and Facebook In Garde-Hansen, J., Hoskins, A. & Reading, A.(Eds.). *Save as... Digital memories*(pp. 135-150).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1]Hatuka, T., & Toch, E.(2017). Being Visible in Public

Space: The Normalisation of Asymmetrical Visibility. *Urban Studies*, 54(4), 984-998.

[22]Hodgson, J.(2010). Reculturalizations: ‘Small Screen’ Culture, Pedagogy, & YouTube. *Enculturation*, 8, 1-21.

[23]Hu, J. C.(2020). We Want a More Private Internet, but We Want to Screenshot It Too.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21, from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20/02/screenshots-text-conversations-privacy-social-media.html>.

[24]Jaynes, V(2020). The Social Life of Screenshots: The Power of Visibility in Teen Friendship Groups. *New Media & Society*, 22(8), 1378-1393.

[25]Lange, P. G.(2008). Publicly Private and Privately Public: Social Networking on YouTub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1), 361-380.

[26]Lynch, M.(1999). Archives in Formation. Privileged Spaces, Popular Archives and Paper Trail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2(2), 65-87.

[27]Lyon, D.(2017). Surveillance Culture: Engagement, Exposure, and Ethics in Digital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824-842.

[28]Moore, C.(2014). Screenshots as Virtual Photography: Cybernetics, Remediation, and Affect. In Arthur, P., & Bode, K. (Eds.). *Advancing Digital Humanities*(pp. 141-160).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9]Nora, P.(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30]Pond, P. & Lewis, J.(2019). Riots and Twitter: Connective Politics, Social Media and Framing Discourses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2), 213-231.

[31]Rollason-Cass, S. & Reed, S.(2015). Living Movements, Living Archives: Selecting and Archiving Web Content During Times of Social Unrest.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20(1-2), 241-247.

[32]Sigman, A.(2012). Time for a View on Screen Time.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97(11), 935-942.

[33]Švelch, J.(2021). Redefining Screenshots: Toward Critical Literacy of Screen Capture Practices. *Convergence*, 27(2), 554-569.

[34]Szulc, L.(2019). Profiles, Identities, Data: Making Abundant and Anchored Selves in a Platform Society. *Communication Theory*, 29, 257-276.

[35]Thompson, J. B.(2005). The New Visi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2(6), 31-51.

[36]Vitols, M. Z. & Lynch, C.(2015). Back in the Saddle Again: Ethics, Visibility, and Aging on Screen. *Anthropology & Aging*, 36(1), 11-19.